



《博尔赫斯与我：一场邂逅》
美杰伊·帕里尼著
普照译
译林出版社

带着博尔赫斯旅行

□李北园

不是带一本博尔赫斯的书去旅行,而是带着这位伟大的作家上路。1971年初春,杰伊·帕里尼迎来了这样一次机会。一辆车,两个男人,亲密无间的一周。博尔赫斯年长,71岁;杰伊·帕里尼年少,22岁。规划的路线是从英国苏格兰东海岸的圣安德鲁斯出发,横穿苏格兰荒野高地,目的地指向苏格兰北部的因弗内斯。

有趣的是,一老一少的两人非亲非故,纯属邂逅。杰伊·帕里尼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,毕业于拉斐特学院,这位腼腆柔弱的“妈宝男”,是坚定的反战派。大学毕业后,为了追逐写作梦,也为了逃避征兵,他漂洋过海来到苏格兰,入读圣安德鲁斯大学,跟随该校英语系主任亚力克·福尔克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。

帕里尼在安德鲁斯大学的生活并不如意:导师反对他的论文选题,毕业看上去遥遥无期;心仪的女孩贝拉·洛名花有主,和他玩着默契的三角恋;父母一个劲催他回国,把专业改成法律;从美国发来的征兵函接二连三寄到学校,他胆战心惊把它们捆起来藏在内衣下面,生怕有一天自己被抓回国……好在帕里尼认识了阿拉斯泰尔——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不羁诗人。帕里尼视阿拉斯泰尔为诗歌导师兼朋友,阿拉斯泰尔也十分欣赏这位年轻人,乐意把自己积攒起来的人脉和资源分享给他。

1971年初春,博尔赫斯来到苏格兰,受邀住在阿拉斯泰尔家中。这位老牌拉美作家早在1935年就因短篇小说集《恶棍列传》而功成名就,此时距离他更著名的小说集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出版,也已经过去27年。时光无情,博尔赫斯已垂垂老矣,而且双目失明。帕里尼回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:“老人蜷坐在阴影中的高背椅上,拄着一根象牙手柄手杖,头发向后梳去。他看上去就是七十一岁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,甚至可能还年长十岁,身穿一件宽松的棕色细条纹西装,袖口宽大,格子马甲上横跨了一条金色饰链。”

而在开始交谈之后,帕里尼见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博尔赫斯。他十分健谈,无所忌讳地向在场的人介绍他的传奇家族、爱情、写作与奇特婚姻。他出口成章,记忆力惊人,几乎知晓这世上的一切。当天晚上,博尔赫斯还带着大家去户外的海滩散步。没错,失明的博尔赫斯第一个提议,第一个站起来,第一个冲向海边,还从一团隆起的马拉姆草丛中跳进水里。

见到博尔赫斯的次日,帕里尼接到电话,阿拉斯泰尔临时有事要去伦敦大约一周时间,委托帕里尼在他离开期间去陪伴博尔赫斯。帕里尼接下了这个“美差”。利用这一周时间,来一趟穿越苏格兰荒野的旅行,则是博尔赫斯的提议,他想去拜访苏格兰北部因弗内斯一位名叫辛格顿的人。为期一周的贴身相处,完整地塑造了博尔赫斯在帕里尼心目中的形象,虽然这次旅行之后,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,但帕里尼相信正是这个“自恋且有点儿疯狂”的老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他自此改换了博士论文的题目,坚定了从事文学事业的决心,克服了在爱情上的软弱,在离开母亲和家乡后,终于成功“断奶”。

《博尔赫斯与我,一场邂逅》完成于那次旅行的五十年后,帕里尼用极为生动的笔墨描写与博尔赫斯相处时的种种细节。比如,博尔赫斯在喝东西之前有个习惯,不管是冰凉的啤酒还是烫嘴的咖啡,都要用手搅一搅,然后把手放在嘴里舔一舔。舌头似乎是这位伟大作家感知世界的重要通道,在丹弗姆林的卡内基图书馆,博尔赫斯抽出一册司各特的书,贪婪地舔舐书脊,猫一样的舌头循着细长的皮革书脊一路舔过去。

丹弗姆林的卡内基图书馆,是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资助建立的,当地人引以为傲。博尔赫斯虽然满肚子优雅的“图书馆情结”,但在和人聊天时,对已故的卡内基却出言不逊:“我听说他是个愚蠢的小个子男人,但很有钱。他能使美元增值。让事物成倍增长,这也许是一种天赋。我曾试图多造出几个博尔赫斯来,但没成功。”

沿途,他们经过亚历山大·塞尔柯克的家乡拉戈,在当地的克鲁索旅馆餐厅,谈到“适度”的话题,博尔赫斯发表了他的见解:“孔子说,中庸是最高尚的美德,在人群中是罕见的。佛教徒称之为中道。亚里士多德认为,适度是美德的本质。我说凡事都要适度,甚至适度也要适度。”

一部事后五十年的回忆之作,尽管妙趣横生,但因为实在太像一本小说,《博尔赫斯与我,一场邂逅》也引发一些质疑。话说回来,在这个连昨夜里发生的事都不能被准确回忆的现代社会,苛求文学作品的精确,实在是不解风情。



《病非如此：一位人类学家的母女共病絮语》
刘绍华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人字的结构

□陆远

50岁之前,人类学家刘绍华一直研究疾病与医疗。50岁那一年开始,她自己却成为疾病研究的样本——这一年盛夏,她独自在医院接过淋巴瘤诊断报告,而就在几天前,八旬老母确诊阿尔兹海默症,母女沦入“共病”的泥沼。此后不久,叠加席卷全球的疫病,整个家庭也一度陷于混乱,生病的人不好过,没生病的人也不好过。漫长的疗治过程何尝不是生命的动荡转型,只是再多无奈与痛苦也无法逃避。刘绍华“把自己作为田野”,以病人、女儿、爱人、学人、照护者等多重身份,体验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洗牌,也开启了审视感情、身体、自我与生命的另一扇窗。从重病中重生后,刘绍华写下了《病非如此》,记述了自己与母亲这一段跨越身心边界的悲欣经历。

不止一位采访过刘绍华的记者说过,这个看上去温婉娴静的学者,性格耿介,“不太好打交道”。其实,只要看看她的履历,就知道这并不奇怪。她曾长期在全球赤贫之地做志愿者,也曾身陷南亚小国的武装暴动,还曾在毒品与艾滋病肆虐的山区深度调查。见过形形色色的不平、不美与不善,刘绍华会刻意远离升平世界里那种岁月静好的虚幻表演。但就如她自己所说,“岁月如月,有光亮的一面,也有从地球上永远看不到的另一面,任何一面都值得探索。没有位移,就看不完全。”在《病非如此》中,我们读到的是另外一面的刘绍华,一个面对身心钝击煎熬、社会关系局限、灵性彷徨张望,同样敏感脆弱的寻常女子。只是寻常中的不寻常在于,她没有被疾病摧毁,反而获得了另一种勇气和智慧。

人类学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,关注焦点在于人际联结,或曰社会关系。作为人类学家,刘绍华意识到,病人的创伤不仅来自身体层面的苦痛,也来自社会关系的改变,而后者却常常被忽视。疾病是一面关系与人性的放大镜,往往将病中人际关系的变形加倍投诸患者身上,最常見的是亲友间情感的撕扯乃至断裂。尽管人人都知道,家人亲朋的关怀与照顾是病人得以渡劫的重要支持,但世上终究难有“感同身受”这件事,往往正是那些不明所以或不知所谓的关怀,看似善意却背道而驰,雪上加霜。刘绍华根据自己被“冒犯”乃至被“伤害”的经历,总结出“不要对癌症患者说的十类话”,句句出自肺腑,是颇有价值的医学人文书写。

当然,冲突与断裂之外,疾病有时也潜藏着人际关系修复和重生的可能,刘绍华的前辈同行、医疗人类学家凯博文教授,在照护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妻子十多年后突然认识到,“人需要照顾他人,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”。他的意思是,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起点,都是从“被照顾”开始的,那么,或许唯有进入照顾者的角色,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体验。病患与照护者的良好互动,有如一种拼图式的磨合,彼此的性格、情绪与需求皆有凹凸,如何搭配而人我安适,是双方都需要修习的功课。真正良好的照护,往往能成为巨大的意义来源,因为对于每个人的生命来说,接纳衰败几乎和迎接成长一样重要。在经历了全家最初的鸡飞狗跳之后,刘绍华惊喜地发现,日益“糊涂”的母亲反倒日益成为把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混凝土。如果不是家人彼此扶持,跌跌撞撞地穿过了最初黑暗的隧道,就未必能认识到生命中真正值得宝贵的关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疾病又好像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门神雅努斯:一面是毁灭性的,打破了许多既有的关系;另一面是建设性的,意味着新的开始。

进而言之,许多疾病的疗愈,有赖更广阔的社会联结托底,刘绍华称为“社会安全网的密度与韧性”。母亲患病之初,她不理解老人家为什么明明已经感受到自己日益明显的失智症状,却总想着出门,即使没有任何目的,即使常令家人遍寻不着坐立难安。后来,她慢慢明白了,这是母亲本能的自救:“她的本能是去到有人群的地方,去看外界的生活,去寻找新鲜风景。母亲想重拾与外在的连接,那个链接能转移她的注意力,减轻她的孤独感。”人是社会性的动物,温饱之外,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与他人的链接。焦虑社会,人们动辄emo,往往把抑郁的起源归咎于病人身体器质性的病变,殊不知与原原本本熟悉的生活步调和人际互动的断裂,可能是心灵失调最大的导火索。这时,寻常再“俗气”不过的市井烟火街谈巷议,也许就能给枯萎的精神世界带来莫大的抚慰。

多年来,不仅我们的家庭教育没有为生命哲学留下容身之地,连相关正规专业教育也大多阙如。而刘绍华以她和母亲多年与病痛鏖战的经验告诉我们,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之道,该是所有日常教育的一部分,而非只有专业人士才需要理解的事。

删言快语



《奇迹男孩》
雷淑容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你就是奇迹

□删乐昊

小说《奇迹男孩》被搬上电影之后,成为 Cinema Score 史上少数获得 A+ 评分的电影之一,荣获第90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最佳成就奖提名,以及第22届金卫星人道主义奖。对于《奇迹男孩》的作者 R.J. 帕拉西奥来说,这些奖项,似乎也像一句间接的道歉,在对她当年邂逅的那个小女孩说:我很抱歉,但你也一个奇迹。

帕拉西奥有一次带着孩子们外出,路上,他们停下来买冰淇淋,结果发现排在队伍中的一个小女孩脸部严重伤残,帕拉西奥才三岁的儿子看到女孩的脸之后,被吓得哭了起来。为了避免孩子的尖叫哭闹声伤害到小女孩及其家人,帕拉西奥慌忙地带着孩子离开了,就在他向外走的时候,她听见身后小女孩的母亲在用冷静、友好的声音说:“好了,孩子们,我们该走了哦。”

这次短暂的邂逅,始终在帕拉西奥的脑中挥之不去。她很自责,不知道自己当时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,也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每天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事,更不知道那个母亲内心到底需要多么强大,才能日复一日保持住自己的冷静,始终用开朗友善的言辞,为脆弱孩子撑起一座贴身的避风港……这是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体谅,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对其他孩子的共情。

就在那天晚上,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娜塔莉·莫森特的歌曲《奇迹》:“医生从遥远的城市/来看我/他们站在我床边/对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//他们说我一定/上帝亲自创造的/奇迹/迄今为止他们不能提供/任何解释……”她随即开始动笔,开始创作这部小说。

《奇迹男孩》是帕拉西奥的处女作,在此之前,她毕业于设计学院,主修插画,是一名平面设计艺术主管,但她始终梦想着能创作出像《小王子》那样感人至深的儿童文学,《奇迹男孩》一举成名,连续120周蝉联《纽约时报》童书排行榜榜首,从某个角度上来说,这也是作者帕拉西奥本人梦想成真的一个“奇迹”。

“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十岁小孩……一个普通的孩子不会在操场上吓得别的普通孩子失声尖叫,四散逃开。我知道,一个普通的孩子无论去哪里,都不会被人一路盯着。”小说以男孩奥吉的第一人称自述开场,这个男孩自出生起接受了二十七场手术,有一张很吓人的脸庞,他的母亲曾是童书插画家,为了照顾他,不得不辞去工作留在家中。奥吉十岁之前没有上过学,父母为他精心挑选了一所学校,希望他能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,去读书,去交友,去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接触。

奥吉在犹豫中展开了异常艰辛的校园生活,孩子们对他瞠目结舌,一个叫朱利安的男孩更是想方设法地取笑和欺负他。可是,当校长叫来朱利安的父母时,身为学校校董的父母不但没有对奥吉道歉,反而责怪校长为什么要招收这样异类的孩子,控诉奥吉的长相吓到了自家孩子,导致自家孩子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。他们举办派对,但不邀请奥吉,连那些跟奥吉成为朋友的孩子也被排除在外,甚至发布学校合影时,也会故意PS掉奥吉的脸……

《奇迹男孩》的中文版译者雷淑容在翻译这部小说时,一再忆起自己儿时同村一个被人叫作“傻子”的男孩,他不仅面瘫,还瘸腿,也是全村诅咒欺凌的对象。她一边翻译,一边把奥吉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土豆听,土豆懊悔地告诉她,自己小学班上也有这样一个男孩,因为患有鳞屑病顽疾,皮肤粗糙掉皮屑,全班同学都不敢接近他,仿佛他带毒。他拿过的本子会被同学移到太阳下消毒,甚至有同学拿盘子摔他,打他。土豆一开始没有欺负他,但后来也会跟着同学一起把他碰过的本子拂在地上。雷淑容大为惊讶,责问土豆为何从来没有讲过此事,土豆委屈地说:“如果我告诉你,你就会逼我跟他做朋友,如果我跟他做朋友,我所有的朋友都会不理我,还会欺负我,如果有人欺负我,你就会跑到学校保护我……这太丢脸了。”

一个故事跟另一个故事重合了,而这恰恰是《奇迹男孩》的普遍意义所在,它指出了“歧视”作为霸权的结构属性,这种结构性议题,同样适用于种族、阶层、性别等其他更为重大的议题——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奥吉,每个人自己也都可能就是那个奥吉。